

湖湘

周秋光 张少利 许德雅 王猛 著

湖南社会史

二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人民出版社

文库

周秋光 张少利 许德雅 王猛 著

湖南社会史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湖南社会史: 全2册 / 周秋光等编.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438-9624-6

I. ①湖… II. ①周… III. ①社会史—湖南省 IV. ①K29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69083号



湖湘文库(乙编)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社会史 (共2册)

著者 周秋光 张少利 许德雅 王 猛

责任编辑 郭 平 赵超峰

整体设计 郭 平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营销部电话 0731-82683348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960×640 1/16

印 张 96.25

字 数 1121000

书 号 ISBN 978-7-5438-9624-6

全 套 定 价 28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 湖南·长沙市金洲新区泉洲北路100号 邮编: 410600

ISBN 978-7-5438-9624-6



9 787543 896246 >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晚清卷·社会生活

第七章 晚清时期湖南的物质生活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开始步入近代社会。在社会生活领域，“它已不属于古代的社会生活范畴，而属于近代的范围”^①，晚清时期湖南的社会生活同样如此。“一代社会生活的形成乃至变异，必然意味着社会关系以及相关的社会秩序的变动”^②。同理，社会的变化也在各个层面影响着社会生活。湘军的崛起，使本为内陆省份的湖南在传统社会生活领域风头极盛，近代领域关隘重重；而甲午战争的惨败，却使保守的湖南甚为激进，近代社会生活色彩鲜明。所以晚清时期湖南社会生活的近代化进程复杂多变，特色鲜明。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湖南的物质生活与其他省份和地区的物质生活虽然存在差别，但是相同之处更多。1840年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在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个最为明显的表征就是物质生活的变化，“衣、食、住、行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也是反应社会变革最为敏感的领域”^③。晚清时期湘军的崛起对湖南的影响很大，影响了物质生活的正常演变，使传统物质生活发展至鼎盛，而近代物质生活却停滞不前。甲午战争的

① 史革新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29页。

② 陈宝良著：《明代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③ 周俊旗主编：《民国天津社会生活史》，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

惨败，震醒湖南，他们思变图强，走在时代前列，新风尚迅速吹绿三湘大地，物质生活近代化进程急速加快。社会环境变化对物质生活影响很大，以甲午战争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为湖南传统物质生活的辉煌时期（1840—1894），后为湖南近代物质生活的快速起步期（1895—1912）。

第一节 晚清时期湖南物质生活状况

鸦片战争后 10 多年，湖南社会受外界影响较小，仍为传统农耕社会。1851 年，太平军兴，太平天国运动改变了湖南碌碌无为的状况，湘军崛起，湖南备受瞩目，同时也造就了湖南以守旧排外闻名于全国。甲午战争，湘军惨败，深刻地刺激了湖南人，他们思变图强，走在时代前列。社会环境的剧变，使得晚清时期湖南物质生活在传统领域辉煌，在近代领域急进。

一、甲午战争前的物质生活

鸦片战争后，伴随着列强的炮舰，西方的物质文化也开始传入中国，由于其“美观”、“实用”的特点，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接受。作为内陆省份的湖南也没有避免“欧风美雨”的冲击，而是在它的影响下，发生着某些变化，传统与近代并存，但近代特色不明显。而湘军的崛起则改变了这种状况。湘军的兴起，一方面使不少湘人获得了很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又导致了湘人思想上更趋于保守。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一时期湖南物质生活的演变，一方面近代特色明显，另一方面又处处维护保守，排斥外来事物。不过从整体而言，这一时期湖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变化不大，大部分湘人的物质生活在这五十多年间变化极小，或者根本没有任何变化。具体而言，这一时期湖南物质生活演变主要呈现出以下三种态势。

1. 物质生活近代化初现端倪

列强的入侵，通商口岸的开辟，中国经济开始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的经济格局由此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西方的物质方式及其用品输入中国，这些对于近代中国物质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湖南的物质生活也在这种冲击下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其近代化的启动。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西方物质生活方式及其用品通过各种途径、方式开始传入湖南，并为少数湖南人所接受。这主要表现为衣、用上，在住、食、行方面也有接触，但采取的多是抵制的态度。

在服饰方面，其样式基本还是沿袭传统，但其质料随着洋纱、洋布的输入有所变化。自通商口岸开辟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洋纱、洋布、洋棉就是列强出口中国的大宗。这从当时主要的进口口岸上海的进口货物及其比例就可看出，如表7-1所示^①：

表7-1 近代早期上海的进口货物及其比例

年份	进口洋货总值	鸦片	棉织品	棉纱	其他杂货
1850年	390.8万元	54%	34%	6%	6%
1860年	3667.9万元	48%	40%	4%	4%
1870年	4466万元	34%	34%	6%	1%

由上表可见，在这一时期，除鸦片外，服饰的质料洋棉、洋纱的输入占了很大的比例，杂货所占比例较小。由此可以看出，时人对西方各种物质相对更易接受的是服饰的质料，如洋棉、洋

^① 参见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114页。

纱等。这主要是因为洋布、洋纱细密美观，且价格便宜。进口洋货正是在这种物美价廉的双重优势下取得了不少中国人的认可。湖南地处内陆，洋布传入的时间稍晚，但传入后也有不小的市场。如光绪年间修的《巴陵县志》记载：“湖南北多产棉，而巴陵东乡为良，号山花……自外洋贸内地，彼布（洋布）盛行，都布亦因之滞销。”^①原因是“进口棉布之幅门较阔，品质亦细，为原有大布所不及”^②。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用洋布作为服饰质料的还是有一定的人群。在日常生活用品上，由于西方日常生活用品的实用性，传入后也得到一些湘人的认可。如照明用品煤油、马灯、煤油灯等，“马灯即桅灯，清道光二十年后，外国煤油输入，马灯随之销入湖南”^③。不过由于其价格较高，使用的人并不是很多。湖南人不仅直接使用西方日常生活用品，且在其影响之下，一些传统的日常生活用品走上了中西结合的改良之路。在鸦片战争后，西式木器图样传入湖南，对湖南传统的木家具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出现了车木、方木相结合的西式家具”。这在《长沙市工商业及救济事业的沿革》中也有记载：“光绪初年，维时皇仓街一带木器店改作西式木器。”^④

在建筑方面，西方民居尚未出现，西式教堂随着传教士的到来已开始在湖南出现，但影响较小。鸦片战争以前曾有西方传教士来到湖南，但人数极少。鸦片战争后，特别是《天津条约》、

① 杜贵墀：《巴陵县志》卷七《地理志》，光绪十七年刊，第4页。

②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湖南省》第7编，湖南省国际贸易局1935年版，第46页。

③ 《湖南省志·工业矿产志·轻工业·纺织工业》，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1页。

④ 《湖南省志·工业矿产志·轻工业·纺织工业》，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32页。

《北京条约》的签订，从政策上允许西方传教士进入内地自由传教、在各省租买土地、建房自便等，西方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并步步向内地推进。自19世纪60年代起，不少传教士进入湖南，至19世纪70年代，已有一定数量。据一位到过湖南游历的外国人调查，当时仅天主教教徒就有2200余人^①。传教士在湖南设教堂传教且受官府保护，如1862年，衡州黄沙湾地方，因“给还旧址”纠纷发生教案，结果是“官为出资建教堂”^②。这是《北京条约》签订后湖南建立的第一座教堂^③。1892年，马尔定在石门水田修建教堂，是为天主教湘北教区第一所正规教堂^④。这一时期虽然建有教堂，不过数量极少，且多数的教堂“由民房改建，基本上仍保留原建筑的面貌，只是在内部装修上部分采用西方的式样，如采用拱券、柱廊和线脚装饰之类”^⑤。且近代初期湖南人极度排外，教案不断发生，较大的教案如1861年5月至1862年7月间的衡州教案、湘潭教案等，群众捣毁教堂，驱逐传教士^⑥。所以，这一时期西方建筑并没有对湖南的建筑产生多大的影响。

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及对近代交通科技的愚昧无知，初期，国人对西方先进的交通方式普遍采取抵制的态度。如同治年间，英人杜兰德，以长可里许的小铁路一条，铺设于京师永定门之平地，以小火车行驶其上，迅疾如飞，京人诧为妖物。旋经步军统

① 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版，第96页。

② 《衡阳县志》卷二《大事记》，同治十一年刊，第41页。

③ 刘泱泱主编：《湖南通史·近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219页。

④ 刘泱泱主编：《湖南通史·近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

⑤ 刘泱泱著：《近代湖南社会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9页。

⑥ 参考《湖南省志·湖南近百年大事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1~84页。

领饬令拆卸，群疑始息^①。京人对西方近代交通的态度尚且如此，地处内陆又几乎从未与列强发生直接联系的本土湘人对西方近代交通的无知更甚于此。举两例略作了解。1872年6月，曾国藩病歿金陵，其灵柩由新式轮船“威靖号”运返故乡。“船抵长沙，绅民起而大哗，历数年不息”^②。曾国藩为清朝中兴名臣、湖南显宦，湖南人尚且如此对待，可见其守旧观念到了何等程度，对近代交通的排斥又是何等强烈。1879年，郭嵩焘出使归来，省城士绅惊讶于郭嵩焘所乘轮船，不许其进入省河，“以为非洋人通商地方即不得用轮”^③。所以郭嵩焘感叹：“长沙风俗人心尤坏于京师故也。”^④不过这种局面到了19世纪80年代、90年代开始有所变化。1883年巡抚潘鼎新奏准撤选锋水师中营，将其经费九千两购买汽船济川轮，航行于上海、长沙之间。1891年汽轮在上海撞沉，再购湘帆轮。1893年再购慈航轮^⑤。除政府购买了3艘轮船外，1888年湘鄂两省绅商集股十万两创办轮船公司，购买小轮数艘来往航行汉口、岳州之间，甚受新派人士欢迎^⑥。尽管数量很少，但对湘人思想上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湘人观念为之一变”^⑦，“亦有促进一般人士观念的作用”^⑧。可见，在西方近代交通的冲击下，湖南交通还是向近代化迈出了一小步。

① 徐珂编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093页。

② 郭延以编定：《郭嵩焘先生年谱》上册，（台北）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29号，1971年版，第465页；朱克敏：《啜庵杂识，啜庵二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00页。

③ 《郭嵩焘日记》第三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53~854页。

④ 《郭嵩焘日记》第三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14页。

⑤ 经济学会编：《湖南全省财政说明书》，《岁出·交通》，第2页。

⑥ 《湖南省志·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61页。

⑦ 经济学会编：《湖南全省财政说明书》，《岁出·交通》，第2页。

⑧ 《湖南省志·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61页。

其次，通商口岸的开辟，湖南传统商路发生改变，影响了湖南传统交通路线及交通方式的兴衰变化，同时对湖南省区域间物质生活水平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鸦片战争前，广州是清政府特许的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始，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五口通商口岸开辟时才结束。由于湖南毗邻广东，当广州还是清政府允许外国人居住通商的唯一贸易口岸时，湖南便成为外洋贸易输入中国内地，以及中国内地各省货物运出洋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一般是：洋货由广州北上，越五岭，经郴州，至湘潭为集散地，分销各省；各省土货则先集于湘潭，然后经郴州，越五岭，到达广州，分运出洋^①。这条交通路线也就决定了其交通方式、工具的选择，以陆路为主，主要依靠人力、畜力运输。“故湘潭及广州间，商务异常繁盛，交通皆以陆，劳动工人肩货往来于南风岭者，不下十万人”^②。正是这条繁荣的交通路线使得湖南沿线的一些城市兴盛起来，如接近广东的郴州，“郴地南通交广，北达湖湘，为往来经商拨运之所。道咸之世，海舶来通，南货运北，北货运南，悉由此过。故沿河街一带，大店、栈房数十家，客货至，为拨夫、为雇骡、为写船只，终不得绝。诚南楚一大要冲也”^③。这条交通路线不仅促使郴州变得繁华起来，且为这一地区的人提供了不少的就业机会，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如湘潭，“道旁居民，咸藉肩挑背负以为生，安居乐业，各得其所”^④。交通的繁荣使湘

① 参见刘泱泱《近代湖南社会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4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1981年版，第46页。

③ 《郴州乡土志》卷下《贸易》，光绪三十二年抄本。

④ 容闳：《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1981年版，第84页。

潭富甲全省，“凡摊捐皆倍列县”^①。有“金湘潭”^②之美称。可见传统商路沿线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要高于其他地区。

在五口通商之后，广州商务大多转移上海，外洋商品也不再逾五岭陆运入湘，而改由海道北运；云、贵等省物产亦改经广西梧州外运至香港出洋。汉口等地开埠后，北五省（晋、鲁、豫、陕、甘）等物，也多改由汉口顺大江外运出洋，不再经湖南。商路的转移使原来那些依靠传统商路兴盛起来的城市开始走向衰落。如湘潭“五口开，汉口，九江建夷馆，（湘潭）县市遂衰”^③。郴州的衰落则更为明显，“及东南氛靖，海运既通，百货遂徙而之他。加以陆运濡迟，夫骡偷损，富商大贾视郴为畏途。今昔比较，十一悬殊”。城市的衰落，使得大批的脚夫、手工业者及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大量失业。如客栈，“河街店栈，落落晨星，仅存数家，且有不能持久之势”^④，这直接导致了这些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湖南传统陆运商路衰落的同时，湘北商路逐步开辟、发展。主要由长沙溯湘江，越洞庭，经岳州，入长江，以达武汉。交通工具也随之而变，由之前的“交通皆以陆”发展为以帆船水运为主。

2. 湘军崛起强化了物质生活的传统性却阻碍了物质生活的近代化

湘军崛起，使湘人获得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这一方面使

① 陈嘉榆修，王闿运等纂：《湘潭县图志》卷六《赋役》，清光绪十五年刻本。

② 姚念杨、吕懋恒等修：《益阳县志》卷二，《舆地志》下，《风俗》，清同治十三年本。

③ 《湘潭县志》卷十一，《货殖》光绪十五年刊，第3页。

④ 《郴州乡土志》卷下，《贸易》光绪三十三年抄本。

湖南物质生活在传统范围内获得快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却阻碍了湖南物质生活的近代化。

湘军将帅士兵在战争中获取了丰厚财物，回到湖南后，广置良田，建造屋宇，“旧时凿井耕田之子，椎牛屠狗之夫，皆高牙大檐，美衣华屋，以自豪于乡里”^①。正是在这批人的影响下，湖南人一改之前勤俭之习，社会出现了一股奢靡风气。“未开海以前，湖湘风气固塞，民人习勤，士夫俭素，可谓藏富于民。自前清咸、同军兴，长沙既未被兵，湘人以与于洪、杨及捻回平乱事者，功名多显，世族骄奢，渐及于社会，益以远物浸淫，市井婆娑，厥风奢矣”^②。甚至连较偏僻的新宁也受到波及，“新宁风俗，向称淳朴俭约礼。自前清道、咸军兴，军界人员，自外濡染，渐化奢靡”^③。正是在这股奢靡之风的影响下，湖南的物质生活在传统范围内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服饰方面，虽然样式没什么变化，但其质料却多用传统名贵的丝、绸、绫罗等。在兴宁，“至于服饰，向惟夏葛冬棉，所衣布苴皆家人妇女纺绩而成，名‘家机布’，冠履不甚趋时，即皮服亦稀。近则狐皮灰脊，竞相绚（炫）耀，视羔皮直粗布耳，绸缎、纱帽、哗叽、罗罗大呢，相习成风，而于妇女尤盛”。在装饰上也变得更为华丽，“旧惟裙布，钗荆玉，乡皆缠足，以尖小为尚，不事脂粉细饰，今则首饰尽用金银，上刻花卉、人物等类，名曰‘泮玺’，异样生新”^④。在常德的澧州，“旧城乡衣纯用棉布，见

① 刘蓉：《与瑟庵从弟书》，《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五十六，文海出版社。

② 子虚子：《湘事记·商业篇》，民国二年六月版。

③ 曾继梧编著：《湖南各县调查笔记》，民国二十年，和济印刷公司代印，第134页。

④ 郭树馨等修：《兴宁县志》卷五《风土志》，清光绪六年本。

衣绫绸者相顾愕盼，今庶民绣衣丝履，不以为异”^①。

在饮食方面，湘军的兴起同样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饮食普遍趋奢。如1871年《长沙县志》载：其时“繁会之区”，习尚渐趋奢侈，“宴客必海味，居处必雕几”^②。益阳，“宴客旧多常味，半杂园蔬。今乃竞罗海味，侈陈大簋，其风自城及乡落矣”^③。可见这一时期的饮食不论其规模还是其品种都是之前传统饮食难以相比的，普遍呈现奢靡化倾向。另一方面，伴随着饮食趋奢的同时，提供饮食的专门场所如餐馆、酒馆、茶馆等也逐次兴起，“今在国在野，皆肆筵召客矣”^④。湖南传统饮食基本局限于家庭范围内，专门为饮食提供服务的酒楼饭馆很少。如1872年修的《桑植县志》记载该县“宴会有节，市无茶坊酒肆”^⑤，道州也是“城市无茶坊、酒肆之设”^⑥。随着宴席规模的扩大及其频繁度的提高，为其提供相应服务的场所就必然出现。据地方志载，早在咸丰年间，长沙就有了大型的专营酒席的餐馆，“咸丰元年，长沙开始有专业酒席和饭菜馆”^⑦。同治、光绪年间，湘军陆续裁撤后，将士拥资归湘，促进了餐馆业的大发展，当时长沙就先后出现了式宴堂、菜香圃、菜根香、必香居等10家，被称为行业“十柱”^⑧。

① 《直隶澧州志》同治八年本；引自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59页。

② 《长沙县志》卷十六《风土》，清同治十年。

③ 《益阳县志》卷二，《舆地志》下，《风俗》清同治十三年本。

④ 《直隶澧州志》清同治八年刊本；引自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59页。

⑤ 周来贺纂修：《桑植县志》同治十一年刊本，卷二《风土志》。

⑥ 李镜容修：《道州志》，清同治三年刊本。

⑦ 《长沙市志》第二卷《大事记》，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70页。

⑧ 石荫祥：《湘菜集锦·前言》，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

在建筑方面，由于受传统观念影响，大多湘军将士拥资回湘后都是置田建房。他们或者在省城或者在自己的家乡营造庞大的住宅、园林，修建宗祠、家庙，从而使传统园林式住宅在湖南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盛极一时。在长沙的如李星沅的李家花园，郭松林的郭家花园，曾文正祠，左文襄祠等^①。其他各地方城乡回乡湘军将领也建有不少园林式住宅，而且由于土地相对比较宽广，所建住宅规模更加庞大。如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五人，在湘乡荷叶塘等地修建府第达9处，分别命名为富厚堂、敦厚堂、奖善堂、万年堂、修善堂、黄金堂、文书堂、有恒堂、白玉堂等。其中曾国藩本人的侯府富厚堂，占地面积达4万余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万平方米^②。后期湘军大将刘锦棠在湘乡杨家滩有100间以上的大屋7栋。浏阳桃树湾刘宅，纵深达9进。醴陵百里乡李宅，有房达600余间^③。在一些湘军将帅较多的地区，更是出现了成群的园林建筑。如时人在《湘潭竹枝词》中描述当时的湘潭是这样一幅图景：“绿杨城郭附江流，名胜东南第一州。十里楼台皆傍水，四时弦管不知秋。”^④

在行方面，湘军的兴起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一是为满足作战的需要，大量的船只被制造，这促进了一些地区造船业的发展。如1853年，曾国藩于衡阳筷子洲设造船厂造战船，练水军，衡阳造船业从此兴盛^⑤。为提高作战能力，湘军还仿制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战船，《湘潭交通志》中载：“清咸丰、同治年间，曾国藩为装

① 黄纲正著：《湘城沧桑之变》，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页。

② 杨慎初主编：《湖南传统建筑》，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

③ 《湖南省志·建设志·建筑业》，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319页。

④ 引自何光岳《三湘掌故》，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18页。

⑤ 《衡阳市交通志·大事记》，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备湘军水军，在杨梅州开办船厂，仿制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日战船，如‘长龙’等。”^① 不过这些船只主要用于战争，民用的相对较少。二是湘军的兴起，财富增加刺激了某些传统交通工具一度兴盛。如轿业，据记载，近代前夕，长沙、湘潭已有经县衙批准营业的轿行，不过规模不大，人数也少。到道光年间，有所发展，“湘军兴起后，发展更为兴旺。1884年长沙城厢有轿行7家，轿夫200余人”^②。

湘军兴起促进湖南物质生活在传统范围内迅速发展，但在近代物质生活领域却鲜有影响。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湘军虚骄之气兴盛，自傲、排外守旧思想极度膨胀。

湘军兴起本身是以维护纲常伦理、保卫圣道相号召的，如湘军动员文告《讨粤匪檄》中就这样写道：“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以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③ 镇压太平军后，高度的成就感和荣誉感滋长了湘人的自负感与使命感，强化了湘人自觉卫道、鄙夷西方事物的社会心理。梁启超曾说过：“发逆之役，湘军成大功，故嚣张之气渐生，而仇视洋人之风以起。”^④ 湘人思想上保守、排外，对新事物，尤其是西方事物采取了一种抵制排斥的态度。湘人由仇视洋

① 《湘潭交通志》，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

② 《湖南省志·城乡建设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9~520页。

③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史料丛刊》续编4号，第12685~12686页。

④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二，《湖南广东情形》，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29页。

人发展到“耻闻洋务”^①，排斥西方近代物质生活。19世纪60至90年代，以奕訢、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发起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但湖南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自鸦片战争至英法联军之役，中国所发生的‘千年变局’，湖南人是无动于衷的。湖南人的守旧态度，有似一口古井，外在的激荡，没有引起些许涟漪。所以当自强在沿海地区进展的时候，湖南人仍然在酣睡之中，三十余年的自强运动，于湖南人几乎完全是陌生的”^②。正如时人所言，“不愿师他人之长，其义愤激烈之气，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为最”^③。一位外国传教士曾称：“中国的保守主义，以及对所有外国事务的反感，都在这儿（湖南）集中起来了。”^④这种耻闻洋务的心态严重阻碍了湘人对西方社会的认识和洋务事业在湖南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湖南物质生活的近代化进程。如郭嵩焘提出宜造“火轮船”，设“火轮车道”，开办电报等业，但遭到绅民的反对，谓“洋人机器所至，有害地方风气”，这样不得不中辍其事^⑤。这使得湖南物质生活与近代化失之交臂，导致自鸦片战争以后长达50多年里湖南物质生活向近代化迈进甚微。

3. 湖南物质生活近代化程度较低

这一时期湖南的物质生活，不管是从地域范围上看还是从人口比例上看，绝大部分地区居民还是延续着传统物质生活，近代化程度低微。从整体上看，物质生活领域变化极小，甚至根本没

① 《读湘报》，《申报》1898年7月20日。

② 张朋园：《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南省（1860—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版，第131页。

③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总第4051页。

④ 周锡瑞：《革命与改良——辛亥革命在两湖》，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9页。

⑤ 《湖南省志·湖南近百年大事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1页。